

“提升义务教育质量大家谈”系列报道(下)

编者按:全面认识教育质量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基础,而落实实施途径是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关键。继1月15日本报推出“提升义务教育质量大家谈”系列报道上篇《直面时代挑战 重新认识教育质量》后,今天推出下篇——

探索落实途径,提升义务教育质量



教育要树立全面的质量观

——访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任袁振国教授

□本报记者 言宏

近日,就未来如何落实义务教育全面质量,记者采访了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任袁振国教授。

袁振国表示,目前,有些人对教育质量理解有些偏差,比如把教育质量仅仅理解为学业成绩。经过疫情之后的反思,人们应该用新的视角看待教育质量。正视疫情中暴露出的国民综合素养的一些缺陷,如盲目跟风、缺乏独立判断能力等。“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再来重新探讨中国义务教育全面质量的落实问题,特别有价值。”袁振国说。教育的功能在于育人,教育的价值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个性发展、主动发展和终身发展。教育要树立起一个全面的质量观。

谈及如何认识中国义务教育质量,袁振国的语气很肯定:“中国义务教育质量在世界范围内是比较高的,我们不要妄自菲薄。”他认为高质量主要表现在三点:一是中国的基础教育学业水平比较高;二是义务教育的公平水平比较高,尤其是薄弱学校提升很快;三是中国的教育体系比较优秀,特别表现在教师的水平之高上。

在袁振国看来,中国基础教育经过了“有学上,效率公平兼顾”“上好学,更加关注公平”等两个阶段,目前进入了追求“更高质量,更公平”的新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对教育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

“教育是为了培养创造未来的人。”袁振国说。他认为高质量教育应该是学习投入、学习体验和学业成效的累积。未来,提高教育质量必须在“拓展、深化、提高”六个字上下功夫,“即从认知能力向社会情感能力拓展、从基本素养向核心素养深化、从全面发展向提供适合的教育提升”。

培养社会与情感能力,让学生更成功幸福

研究表明,对人的事业成功和生活幸福具有极大影响的是处理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的能力,是心态和性格,人们常称之为情商,学术的表述是“社会与情感能力”。一直以来大家比较重视知识能力的培养,而未来会更重视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培养。袁振国认为,社会与情感能力表现在情绪控制、沟通协作、复合能力、与人交往、思想开放等,具体来说要提高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加强人的责任感,提高管理领导力,增强同理心、同情心、善良心等。

社会与情感能力如何测量?面对记者的疑问,袁振国介绍了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基于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的研究成果建构的社会与情感能力的测评框架。包括:任务表现(尽责性);情绪控制(情绪稳定性);

协作(亲和性);思想开放(开放性);与人交往(外向性)。每个维度又确立了不同的测评指标,任务表现的指标包括成就动机、自我控制、责任感和毅力;情绪控制的指标包括抗压、乐观和情绪控制;协作的指标包括同理心、合作与信任;思想开放的指标包括好奇心、创造力和宽容度;与人交往的指标包括活力、果敢和乐群。除了五大维度之外,还有一项“复合能力”,即个人技能不同方面的组合,指标包括自信心、元认知和批判性思维等。

我们如何根据理论采取措施对孩子提供帮助?袁振国说,未来教育要着重研究不同年级或年龄孩子的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水平有何不同;不同性别与家庭背景孩子的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差异是什么;哪些社会与情感能力能够

预测儿童的成功或幸福;什么样的家庭环境能够促进孩子的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如教养方式和家庭可获得的学习资源);什么样的学校环境能够促进学生的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如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和学校资源);什么样的社区环境能够促进孩子的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如运动、文化资源与安全)。

培养未来人才的应对能力,必须高度重视认知能力和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培养,保持这两种能力的平衡。认知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遗传的,后天改变的空间有限,而社会与情感能力主要是后天习得的,是可以培养的,因此,“对我们来说,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培养尤其需要强调。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培养可以成为发展素质教育瓶颈的突破口。”袁振国说。

培养核心素养,让学生走向学习的中心

核心素养是人们应对未知世界的必备品质和关键能力。经合组织教育报告认为,核心素养是以知识技能、思想方法为基础,整合了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袁振国说重点是要把学生的分散学习变成综合学习,增加任务学习、合作学习、项目学习等。学生“高分低能”被人诟病,就因为大量的学科知识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因此,要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以解决复杂的真实问题。解决实际问题要向企业家学习。企业家们往往文化程度不高,但是却能综合应用知识,解决问题能力很强。

学校教育具体该如何做?袁振国

提出三个建议。一是要整合学校课程资源,强化综合性,比如浙江省的科学课程和社会课程的综合改革。二是要改革学校的教学方式,让学生进行研究性、项目型、场景化的合作学习,改变教师讲、学生听的方式,以便让学生的知识能力真正综合起来。教师的角色应该从演员转变为导演,教师不是自己表演,而是帮助、协助、欣赏学生表演,促进学生自主发展;学生应该从观众、听众席上走向教学舞台的中心,成为表演者,在表演的过程中增长知识,增强自信,实现人格的独立。三是要加强教师的培养,让教师获得全面发展。教师要懂各科知识,有跨学科

的能力,才能对学生进行综合辅导,因此要提高教师的综合能力,培养学科性的教师成为综合性教师。

在袁振国看来,人工智能时代人才的核心素养包括创造性思维、批判性思维、信息处理能力、沟通交流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这就要求基础教育要着力培养“更具互动性的人”,相应地也要求教师从知识灌输者、过程控制者转变成“心灵按摩师”“缺点转化师”“智能协作师”“综合评价师”“私房菜厨师”“实践议题师”等。未来,教育将更复杂、更富于情感性,正确的全面质量观的落实离不开教师,未来教师将成为心灵教练,更富有艺术性。



□省教育厅教研室副主任 张丰

推进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的首要目标是引导地方政府、学校树立正确的教育质量观,构建体现素质教育要求、以学生发展为核心、科学多元的中小学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切实扭转单纯以学生学业成绩和学校升学率评价学校教育质量的倾向,基本形成促进发展、职责明确、规范长效的教育质量管理机制。浙江推进综合评价改革首先突出“教育质量观”与“教育质量管理机制”两个关键词。

在很多人的直觉中,教育质量就是学生的考试分数。分数高则质量好,但这是狭隘的。教育的“质”与“量”分别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描述和评价学生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的全面进步状况,以及学校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中的努力。然而现实中,并不是所有地区、所有学校都奉行这样的全面的教育质量观。

提供学生适合的教育,让学生个性化发展

“要在面向全体学生德智体美劳发展的基础上做到个性化因材施教。”袁振国说,具体来说就是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要强调人人成功,人人出彩。促进所有人的发展,点燃每个人心中的火焰,使每个人充满成功的希望。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就可以为学生个性化成长带来很大便利。

“人工智能时代,网络就是学校,终端就是课堂,能者就是老师。线上教育等形式能为学生提供更加灵活生动和个性化的教育,也意味着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固定人员、固定内容的学校教育正在向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人员、任何内容的‘泛在教育’演变。”袁振国认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基础教育将从现有的“以教定学”发展为“以学定教”,从“知识本位”发展为“素养本位”。

在空间上,学生要能自主学习,要有自主的活动,要增加社会实践活动,对不同的学生要有不同的要求,要允许学生有不同的规格,不能万人“一刀切”。培养有个性的学生从哪里入手?袁振国说,自由选择课程,给学生更多成长的跑道;多元性评价,让学生特点成为亮点;主动性教学,让学生的自主学习、合作探究、自我展示发生;自主性活动,开展模联等社团活动,进行更具互动性的“人”的教育活动。

对教育质量管理机制的反思

教育质量管理是指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通过教育教学评价,指导学校和教师开展教育教学,从而提高教育质量的过。它是从教育评价领域分化出来,同时涉及评价和管理两大领域的专业活动。它相当于教育活动的指挥系统与动力系统,并具有层次性、机制性、指导性、全局性、方向性、时效性等特点。

在教育质量管理中,存在着多方立场。不同层面的人对教育质量的理。教育质量管理必须解决好多方立场的认识趋同,并构建起各有侧重、彼此尊重、机制不同的教育质量管理模型。当前在不少地方,地方官员变相地以“升学率”来考核地方教育工作的绩效,甚至公开宣称教育工作就看“重点率”或“北大清华数”,或者年年提出升学率增长的指标要求。这种将教育业绩聚焦在统计数字的思路,是典型的GDP思维的政绩观。这种“经济模式”的教育质量管理机制夸大了评价的杠杆作用,却忽略了评价的专业标准,对当前基础教育科学发展造成了致命侵害。

在地方政府重视横向比较的氛围中,一些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将这种责任分解下放到学校,并聚焦在关键性的量化指标,对学校工作产生强大的功利导向。学校将责任再度拆分到具体教师。由于评价者与被评价者的对立,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学校领导与教师之间的关系。

教育质量管理具体可从区域与学校两个层面来看,当前问题的焦点在区域教育质量管理机制。市、县教育行政部门被“三面夹击”。他们要面对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正确倡导,还要面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和社会媒体的片面关注,更要面对基层学校、教师、学生与家长的复杂期待。

因此,思考教育评价问题,必须抓住“教育质量管理机制”这个关键,尤其是区域教育质量管理机制。地方政府在教育方面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绩观,克服过于关注横向比较的、“经济模式”的教育管理模式。

分析教育质量应有三个维度

关于教育质量,除了应“全面”看待外,还应“立体”地看待。具体有三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是“结果型的质量”,是指某一时刻,学生个体层面所反映的学习状态与水平。它不应只是综合起来的各科成绩的统计数据,而应是学生个体各学科关键能力进步的分项分析。它需要教师用“过程时态”的眼睛和“发展分析”的态度来研究。

第二个维度是“过程型的质量”,从质量形成的过程来看质量,从课程实施与学校管理(中观层面)来研究质量的形成和影响质量的因素。“过程型的质量”,具体包括学校教学工作状态、教师提供的课程的水准、教育教学过程的质量、教师的工作精神和教学素质等。

第三个维度是“结构型的质量”,也可称为“结构意义的质量”,是从区域教育发展的生态看教育质量进步的潜力或危机。事实上,影响教育质量的绝不只是学校层面的努力,教育发展的结构规划、资源配置以及师资队伍等,是事关教育质量进步或危机的重要因素。“结构型的质量”体现了教育管理决策层对教育教学质量的责任。

我们不可一叶障目地观察和理解教育质量,也不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急功近利地应对。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教师在教育质量上的责任是不同的,有分工的。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着力点应该在“结构意义的质量”。要通过学校规划与结构调整,包括队伍结构与校长使用等工作机制,形成良性的工作局面。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与学校的着力点应该在“过程型的质量”。要建立尊重学科特点的教育教学常规,建立常态教育教学的视导体系,通过规范教育教学行为,改进教育教学过程,帮助教师克服“重教轻学”的积弊,促进学生有效学习。

评价维度要改革



□余姚市姚北实验学校校长 吴建岳

探讨教育质量话题,首先要回归教育本质。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教育质量被狭义地理解为考试分数和升学率,由此导致学生过度竞争、家长过度焦虑等问题。我们要重新定义教育质量。

教育的核心是培养人的健全人格,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世界观。立德是这一切的核心,而立德要从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入手。近代教育家叶圣陶就说,“教育就是养成习惯”。因此,我认为,在教育质量体系,行为教育是更重要的教育。

分数和升学率的基本含义是目标达成,强调的是结果,而行为教育强调的是过程;分数和升学率是一种关注外在的数字考量,行为养成是一种指向内在的生命指标;分数和升学率是

片段性的,但行为养成是终身的。

鉴于行为教育在学生未来成长中的重要性,作为教育者,要把行为教育融入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全过程。比如,可以营造好的教育环境培养学生的行为习惯,可以推行多元评价机制激励学生的行为习惯,可以开展体验活动引导学生的行为习惯。同时,每一所学校都应做好师德师风建设工作,引导教师把教书育人和自我修养结合起来,做

到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作为家长,必须调整自己的行为思维模式,使之符合良好行为规范的要求,让自己成为孩子的榜样,从而影响和带动孩子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

只有树立科学的教育质量观,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并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才能真正培养出肩负民族复兴重任的希望一代。

行为教育比知识教育更重要

真正的教育途径是率先垂范

的教育途径是率先垂范。

疫情当前,学生宅家,家长朝夕相伴,不同的家长对孩子的影响有着巨大的差异。早睡早起、坚持阅读、经常锻炼的家长给了孩子正面的教育,而沉迷手机、慵懒消极的家长对孩子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疫情过后,孩子的差别必将更加明显。这让我们看到真正的教育途径还是垂范。

家庭教育对学校教育是很有启发的。疫情过后,孩子们回到校

园,一线教师要像优秀的父母一样,努力做孩子真实的积极的榜样。比如德育,希望学生成为诚实的人,教师就不能欺骗;希望学生成为善良的人,教师就要有爱心;希望学生成为有担当的人,教师就要敬业;希望学生善待世界,三尺讲台上的教师就要少一分抱怨,多一分宽容。再比如智育,教师要善于独立思考和钻研,学生慢慢就能在课前主动预习、好奇求知,在课堂质疑思考、合作探究,在课后自

主反思、归纳提升。总之,有什么样的教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校园里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教师群体是学校最宝贵的教育资源。

社会中人也应该给学生以垂范。我们要鼓励中小生追真正的“星”,如科技明星。偶像是用来学习的,追星就是要向偶像看齐,如近期,我们要用钟南山、李兰娟、陈薇、张文宏等科学家的感人故事启迪学生,让学生学习刻苦钻研、坚持梦想、乐于奉献等优秀品质。